

明史研究论丛

第十三辑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专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明史研究论丛

(第十三辑)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专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研究论丛. 第13辑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043 - 7246 - 8

I. ①明…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文集
IV. ①K248.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5541 号

明史研究论丛 (第十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刘川民
封面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字 数 395(千)字
印 张 15. 2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7246 - 8
定 价 42.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 万 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鸿林* 伍跃* 张兆裕 张金奎 张宪博 陈时龙 阿风
林丽月* 赵现海 高寿仙* 章宏伟* 鲁大维* 解扬

本期执行编辑 张兆裕 张金奎 陈时龙 赵现海 解扬

本期目录英译 鲁大维 (David Robinson)

(注:带*者为特邀编委)

编者的话

万明

继往开来，创新发展，是21世纪学术研究的主旋律，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于2013年11月举行了“新世纪明史研究的新热点和新进展”学术研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历史研究所主办、明史研究室承办的有全国各地近80名学者参加的一次明史研究盛会。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再单独出版论文集，特编选了部分会议论文收入本辑中，经过修改，已与会议论文有了一些不同。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明史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成立明清史研究室，组长白寿彝，副组长王毓铨，汇集了国内最强的明史研究阵容，包括白寿彝、王毓铨、谢国桢、傅衣凌（兼）、吴晗（兼）诸位先生，新中国明史学科由此奠基。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明史研究室先后由王毓铨、刘重日、张显清担任室主任，研究人员最多时达28人，研究力量雄厚，形成了国内外公认的学术优势。此后明史室与清史室有分有合。2002年10月明史室独立后，由我担任室主任，立即召开了京、津明史学界专家座谈会，请各位专家为明史学科建设出谋划策。2005年，主要由我室同仁与其他学者合作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出版，其中提出，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它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相联系，即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全球化的开端。因此，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研究中，明史据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009年，经过全室同仁的努力，明史进入了院重点学科之列。2010年，明史室与厦门大学国学院合办“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合作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2011年，明史室与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育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明清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合作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2012年，明史学科开始进入社科院、历史所创新工程，选题是“明代国家与社会——明代官私文书：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同年，明史室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明史室联合主办了“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因缘契合，2013年，我们申报社科院创新工程资助的大中型学术会议，得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批准，就有了“新世纪明史研究的新热点和新进展”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具有特殊意义。30年前的1983年，明史室曾经开过一次明史研究的会议，主题是“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研究”，由老主任王毓铨先生主持，成果部分收入了《明史研究论丛》第四辑，于1991年出版。30年后，明史研究室非常荣幸地成为这次盛会的承办单位，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经与所领导等商议，从新世纪学科

的新热点和新进展出发，我们将会议的议题定为四个：（1）全球化视野下的明代中国与海洋世界。（2）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进程。（3）明代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制度变迁。（4）信息时代的明代文献与明史研究。

实际上，以上四个议题还不能涵盖明史研究领域新前沿发展的诸多方面，我们旨在提供一个学者切磋观点、交流信息的平台，这次学术研讨会促进了明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更对促进新世纪明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斯愿足矣。

谨以此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明史研究室成立60周年纪念专辑。

目 录

编者的话	万 明 (1)
《明史》校勘修订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南炳文 (1)
关于明代中后期的历史走向	
——黄仁宇传统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说述评	张显清 (6)
《万历会计录》的重新认识与明史研究的新议题	万 明 (25)
明清时期社会群体的变动趋向	吴 琦 (43)
海防地理视域下的明代福建水寨内迁	王日根 黄友泉 (53)
榆林长城修筑与明中后期“长城时代”的开启	赵现海 (63)
明末州县官僚的地理分布	
——以《分省抚按缙绅便览》为中心	伍 跃 (97)
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	郭培贵 (114)
从“都司”含义的演变看明代卫所制与营兵制的并行与交错	
——以从“都司领班”到“领班都司”的转变线索	彭 勇 (140)
明代山东小云南移民浅谈	张金奎 (154)
《明太祖实录》勘误一则兼论明代辽东屯田起始时间	陈晓珊 (167)
极权性格的养成	
——嘉靖初年朱厚熜的心路历程(1521—1524)	陈时龙 (171)
毛国科使日考	
——兼谈万历援朝东征后期的和议问题	杨海英 (180)
晚明通俗文学的商业化出版及作者和受众分析	张献忠 (198)
天意流行：明亡原因的另类解读	
——以明清之际野史笔记中的灾异记录为考察对象	张兆裕 (214)
会议综述	
“新世纪明史研究的新热点与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现海 (221)
书评	
《〈明史·地理志〉疑误考正》评介	林延清 (224)
《明代海南文化研究》读后	张兆裕 (226)
译文	
拄杖者：曾鲸和晚明的图像创作	[美] 斯欧克旺·乔伊 撰 刘楠杰 译 (228)
附录	
《明史研究论丛》稿约	(232)
《明史研究论丛》文本格式规范	(233)

Table of Contents

From the Editor	Wan Ming (1)
The Coll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Mingshi and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Age	Nan Bingwen (1)
On the Historical Direction of the Mid-and Late Ming Period Comments on Ray Huang's View that Traditional China "Was unable to produce the sprouts of capitalism"	Zhang Xianqing (6)
A Reevaluation of theWanli kuaijilu and New Issues in Ming Historical Research	Wan Ming (25)
Changes in 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Wu Qi (43)
The Inland Movement of Fujian' s Coastal Forts during the 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e Geography of Coastal Defense ...	Wang Rigen and Huang Youquan (5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ulin Great Wall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and Late Ming "Age of the Great Wall"	Zhao Xianhai (63)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ounty Administrators during the Late Ming: The Fensheng fuan jinshen bianlan	Wu Yue (97)
Research on Schools and the Examination System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	Guo Peigui (114)
Lookedfrom the Evolution of "Dusi" Meaning to See the Parallel and Cross of Weisuo and Yingbing during the Ming; the Shift from the "Dusi Chief" to "Chief Dusi"	Peng Yong (140)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Little Yunnan Migrants of Shandong during the Ming	Zhang Jinkui (154)
Corrigenda in theVeritable Records of Ming Taizai and Comments on When Agricultural Colonies Begin Liaodong	Chen Xiaoshan (167)
Cultivating A Despotic Temperament: The Evolution of Zhu Houcong' s Thinking during theEarly Jiajing Reign	Chen Shilong (171)

Mao Guoke's Mission to Japan and Some Comments on Peace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later stages of Ming military assistance to Korea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Yang Haiying** (180)

Authors, Audience, and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te Ming **Zhang Xianzhong** (198)

Heaven's Shifting Intention: An Alternate Reading of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An Examination of Accounts of Disasters and Aberrations in
Private Writing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Zhang Zhaoyu** (214)

Conference Proceedings

"New Topics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Ming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New Century" **Zhao Xianhai** (221)

Book Reviews

The Comment and introduction Corrigenda in the Geography *Treatise of*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Lin Yanqing** (224)

A Comment *A Cultural History of Hainan during the Ming Period* **Zhang Zhaoyu** (226)

Translation

Men with a Staff; Zeng Jing and Image-making
in Late-Ming Painting **Seokwon choi , Translated by Liu Nanjie** (228)

《明史》校勘修订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南炳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笔者和《明史》界的十几位朋友,自2007年以来一起做点校本《明史》校勘记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基本遵循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先师郑天挺先生领导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诸位先生点校《明史》时规定的校勘诸原则和具体办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原有校勘记进行了复核、修订。

郑先生等在点校《明史》时所规定的诸原则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把重点放在“校史”上,即主要工作为利用本校和他校的办法,将《明史》中的史实失误(包括时间、地点、人名、史事等内容之失误),寻找出来,加以改正或指出。至于利用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等《明史》拟稿作比较,以改正《明史》的文字失误,即进行“校文”,只是修订工作中的很小部分。即使这部分工作中,除“校文”外,“校史”的成分也很大。这与“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各史多数以“校文”为主有所不同。《明史》之所以在校勘中主要做“校史”的工作,乃是因为其书之祖本即殿本尚存于世,其他各本皆是依殿本而翻版,在发现因版本不同而造成文字不同时,只能以殿本为正,不需作什么考证、推敲。换言之,《明史》不需作本书的版本校,在文字上以殿本为准即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明史》中在史实方面存有若干失误,而与明代历代相关的文献存在甚多,爬梳与明代历史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明史》存在的史实失误,于是为了使《明史》记事更为准确,提高其价值,就应该在注意校勘文字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利用与明代历史相关的文献存在甚多的条件,对《明史》从事以“校史”为内容的校勘工作。至于“二十四史”的其他各史,一因其本身存在许多版本,无所谓祖本以定于一;二因他校的资料数量有限,难以据之将其记载的大部分内容考辨出真相,少部分可加考辨者亦往往以所据资料不充分难于得出定论,故而多数史书只好从事以“校文”为主的校勘工作。由此可知,郑先生等在点校《明史》时所规定的原则,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也是可行而行之有效的。有鉴于此,笔者等在这次修订中,完全依从了郑先生等所规定的原则。

在“校史”为主原则的指导下,笔者等的具体修订程序如下。在初稿起草者起草阶段,首先是找出其应予校勘的失误或疑点,其办法有六:①比较本书上下文之相关记载;②比较万斯同《明史》等拟稿;③查阅《明史》及其拟稿外的其他相关文献如《明实录》的相关部分;④查阅点校本《明史》之原有校勘记的相关部分;⑤查阅前贤时彦在报刊刊出的相关研究成果;⑥查阅起草者本人的原有相关读书记录。其次是根据通过上述六个办法寻找失误或疑点得到的印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思考,以得出结论。再次是作出校勘记长编:内容包括摘引有关原始文献记载,按照逻辑加以排列,并作出简要论述,提出明确的正误判断,或作出存疑之决定。

最后是简化校勘记长编的文字，写出简明扼要的校勘记，其内容主要包括正误判断和资料根据。初稿起草者撰写的初稿完成后，修订工作便进入了笔者修改、加工的阶段。在此阶段，首先是对初稿校勘记长编和初稿校勘记进行全面复核，这一复核实是将前一阶段起草者所进行的工作重来一遍，而后结合阅读笔者所积累的有关读书记录，及补读笔者认为尚需补读的前贤时彦研究成果和有关文献等，对初稿的结论加以评判，进而对初稿校勘记长编及初稿校勘记，或予肯定认可，或予补充发挥，或予修改完善，或予否定取消，或推翻重写。若发现除所复核校勘记长编和校勘记外，尚需对此校勘对象所在《明史》中的上下文补作其他校勘记长编和校勘记者，即予补作，以尽量避免遗漏。

迄今为止，大部分初稿起草者已完成了所承担的起草任务，上交了修订版的相关校勘记长编和校勘记的初稿，这些初稿的大部分笔者也已初步改完。将已经初步改完的部分与点校本《明史》相应部分原有校勘记相比，主要是校勘记条数有较多的增加。如本纪部分共24卷，原有校勘记118条，新定821条；地理、礼、乐、刑4志共27卷，原有校勘记204条，新定1907条；宰辅年表2卷，原有校勘记9条，新定103条；前期人物传记91卷，原有校勘记397条，新定1767条。以上所举本纪、志、表、列传，凡144卷，原有校勘记728条，新定4598条，新定者是原有校勘记的6.3倍强，净增5.3倍强。限于时间，其他卷改定的校勘记条数尚未来得及加以统计，而估计其增加校勘记的数量情形，当与上述作过统计的部分大体相当。这次《明史》点校的修订工作是否成功，尚有待最终完成后学界的检验。但笔者个人感觉，由于增补了数量较多的新校记，这次修订工作似可称为有一定的成绩，使《明史》的校勘在郑天挺先生等前辈原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所进展。论功力和水平，笔者等难与郑先生等前辈相提并论，与其相距不下十万八千里，不得望其项背。笔者等何以能取得上述进展呢？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吾等生逢其时。

在20世纪50~70年代郑先生等校勘《明史》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基本上限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市图书馆两馆的藏书。此两个图书馆虽然也算国内有名的较大图书馆，但数量毕竟有限，遇到天津未藏而必须查阅的书籍，只能豫购火车票，搭乘每天只有数趟的火车，前往北京设法寻找，不算两头而只计乘火车的时间，即须花两三个小时，为解决一两字的问题，从头到尾，最为顺利也要花上两三天。另外，更有出差经费极端缺乏的客观不便，非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到北京出差。这使《明史》的许多失误，因此而得到保护，避免了被校勘者发现的命运。此外，其时没有数据库之类新鲜手段，校勘者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选择可能用得上的一本本文献，用手工翻检，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有用资料，以便发现疑点，作出比较和判断。其效率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也使《明史》的许多失误无法被发现。然而到了笔者等修订《明史》校勘的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作条件大大不同。电子图书的问世、多种数据库的出现，使笔者等不出家门，即可几乎能用上全国以至全世界的所有图书馆的藏书，想好主题词，手指一点，即可将有关资料几乎全部集中起来，依次接受检阅，任笔者等对比、选择、分析、判断，从而迅速发现和解决《明史》中的相关失误。这样的条件，是笔者等的先辈郑先生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不能享用的，笔者等由此而在修订中比郑先生等发现和解决更多的《明史》失误，实非不可理解之事。放下电子图书和数据库的条件不谈，从纸质图书在近30多年的大量出版来看，笔者等在郑先生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写出较多数量的新校勘记，也是可以理解的。近30多年，我国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各种事业空前发展，出版非常发达，大量古籍被印刷出来。在被印刷出来的大量古籍中属于明代文献者更占大头。我国印刷图籍虽正式出现在隋唐时代，而真正发达、普及起来，乃在明朝中期。因而现存的古籍属于明朝者所占比例甚大，属于清朝者所占比例也甚大，存世的明清两朝古籍合起来占我国现存古籍的绝大部分。由此在近30

多年大量古籍被印刷出来之中,属于明朝的占了很大比例。如近30多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综合性大型丛书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序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正补编(齐鲁书社1995年至1997年出版)、《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其中《续修四库全书》共收书5000余种,属于明代撰写者为1133种,占总数的1/5以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正编共收书4511种,其中属于明代撰写者2667种,约占总数的3/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共收书219种,其中属于明代撰写者为109种,约占总数的1/2;《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共收书近2000种,其中属于明代撰写者为235种,约占总数的3/25;《四库禁毁书丛刊》共收书600余种,其中明人撰写者397种,约占总数的3/5强。再如,近30多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稍小一点的综合性丛书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商务印书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和第二辑(西南师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8年至2011年出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其中明人撰写者所占比例也很大,如《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地理类收书49种,其中明人撰写者为27种,占总数的1/2强,别集类收书153种,其中明人撰写者为75种,约占总数的1/2。又如近30多年,中国大陆出版的地方志丛书有《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出版)、《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出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序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0年序刊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些丛书,除专收明代方志者外,其余丛书所收方志也以明代撰写者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撰写方志最多的两个朝代,此决定了明代撰写的方志必然成为这些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种种丛书,不仅使数量庞大的明人所撰书籍大量印刷出来,公布于众,而且变分散为集中,变稀见为通行,为修订《明史》校勘时之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再加上近30年中国大陆还出版了《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等许多资料汇编和种种明人文集等单行明代文献,也为修订《明史》校勘时之利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笔者等在这次修订《明史》校勘中所写校勘记比原有校勘记有所增加,实为情理中之事。总之,笔者等取得如上进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信息时代的应有产物。信息时代使笔者等在修订《明史》校勘中如同得到了望远镜、显微镜,安上了火眼金睛,从而可以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明史》中的一些记载失误。

回忆几年来修订《明史》校勘的实践,笔者有几点感受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一是没想到平素奉为经典的《明史》和“明实录”竟然错误甚多。已有的《明史》点校本,已经纠正了《明史》中的相当数量的失误,这次修订却又新发现多几倍的失误(这些新发现难免有的属于误判,但似大部分并非误判),而且这次修订也肯定没能把所有失误全予发现,漏网之鱼必然仍旧存在。《明史》虽不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原始史料,但肯定是学习和了解明代历史的不可不读的最系统、最易读的重要史籍,其存在史实记载的大量失误,显然是不应坐视不管的。笔者在以前接触“明实录”时,已经了解到“明实录”不仅有黄彰健先生等所作校勘记中指出的大量文字失误,而且在史事记载失误方面也常有发生。而这次修订《明史》校勘中,由于“明实录”是最基本的比较史籍,对其接触更为频繁,因而加深了对其了解。一方面对其记载的全面、系统、简要和研究明代历史时之不可一日或缺有了更强烈的感觉,另方面对其大量存在从文字到史实记载之失误或不妥,也有了进一步的察觉,已有的校勘记远未能包罗其文字失误,其尚无专书论列的史事记载之失误或不妥,同样比比皆是。例如史事的发生时间,有实际发生时间、报到

朝廷时间、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办法时间、皇帝批示时间等之异,“明实录”中往往不予分别,笼统记于一天,造成时间模糊不清。又如“明实录”中的人物小传,或有摘自家传行状墓志者,与“明实录”上文的有关记载难免相互矛盾。再如“明实录”中对臣下奏疏的摘录,往往发生失误,与原意不合;其对整个奏疏之概括介绍,如关于该疏内容涉及几事的介绍等,也时见不合实际者。另外,一事在不同年月日重复出现、同一人之名字在不同处所所记互异等,同样常常出现。“明实录”是一个与原始史料极接近,而又含量最大,在研究明代历史时充当基本史料来源的史籍,对于它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显然也是不应坐视不管的。

第二个感受是,应该利用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的大好时机,把整理明代史籍,特别是整理最重要明代史籍的工作大力开展起来。信息时代为搜集史料作历史专题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为作明代历史专题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利用这一机会把明代历史专题研究推向新高潮是应该的。但是,与此同时,也应利用这一机会,把整理明代史籍的工作大力开展起来。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把明代史籍整理得更准确、更可信,可为明代历史专题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使其得出的结论建立在牢靠的基础之上,从而正确无误。反过来,明代历史专题研究之深入开展,可为明代史籍整理工作提供辨别正误的正确尺度,使之在眼花缭乱的纷纭记载面前,不为所迷,分清是非。当前学术界对历史专题研究和古籍整理两项工作有高低不同的看法,在流行的评价体系中更有明显的厚薄不同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是社会浮躁情绪在学术上的反映。有眼光的学者应不受其干扰和左右。笔者呼吁明史工作者,能合理分工,将两项工作皆认认真真地开展起来,在当前的条件下,更强调适于进行明代史籍整理的学者,千万不可忘记投身于明代史籍整理的工作之中。这项工作开展得越早,就能越早地发挥其为明代历史专题研究提供可靠史料的历史作用。在刚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尽早认真、深入地开展起明代史籍的整理工作,是时代赋予明史工作者的一项历史使命,同时也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个人掘得第一桶金的大好时机。笔者建议,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一方面要大力投入,另一方面要分清轻重缓急,根据价值大小轻重,有计划地依次进行。除《明史》校勘修订要继续进行,以求尽量完美之外,要首先进行“明实录”的整理,并尽早选取档案、文集、典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各类型、各领域有代表性的明代史籍加以整理,把整理工作向纵深展开。

第三个感受是为了做好整理明代史籍工作,在重视利用网络手段搜集资料的同时,不可不重视整理者自身基本学识的提高。网络手段,快捷、方便、效率高,这是信息时代的恩赐,时至今日对之忽视、墨守成规者已属极少数,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伴随而生的,是有的人过分依赖网络手段,对自身基本学识的提高不予注意,不肯沉下心来把最基本的史籍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并认真思考,将其精华牢牢掌握,将基本的历史知识牢牢记住,以致形成了脑中空空、缺乏分辨正误、是非能力的状况。这些人一旦遇到众说纷纭的情形,则会手足无措,不知所从。如《明史》卷101《诸王世表》第四代鲁府安丘王之名字记作“(朱)观嫌”。查王鸿绪《明史稿·诸王世表二》亦作“(朱)观嫌”。而《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九作“(朱)观嫌”,卷五六作“(朱)观廉”;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49作“(朱)观廉”,其中“廉”字以小字号置于该行的右半部。当以何种记载为正确呢?这时,可从《明史》同表查出其父名“(朱)健朴”,从而根据明代宗室名字的第二字偏旁应按照父子用字五行相生的规定,否定《明世宗实录》卷五六“(朱)观廉”之说,因其父名字之第二字用“木”作偏旁,其子名字之第二字应用“火”作偏旁。继而根据关于异体字的知识 and 古人避讳尊者姓名的知识,可判断出《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九之“(朱)观嫌”与《明史》之“(朱)观嫌”实为相同,因为“嫌”乃“嫌”之异体字,至于王圻《续文献通考》之“(朱)观廉”,实与“(朱)观嫌”,进而与“(朱)观嫌”皆

无区别，因“廉”字以小号字置于该行的右半部，乃为“嫌”字之缺笔避讳表敬写法。至此，各文献所记第四代鲁府安丘王名字中第二字之差异问题即得到解决，《明史》中作“嫌”当属不误。最后，复查《明史》同卷中与第四代鲁府安丘王同辈的鲁府诸人名字的第一字，可发现皆为“观”字，于是，《明史》中将第四代鲁府安丘王之名字记为“（朱）观嫌”可以最终判定不误，因为按照明宗室名字第一字的用字规定，同王府同辈份者必须皆用明初朱元璋预定下的同一个字，而查万历《明会典》的记载，此“观”字正合朱元璋对鲁府命名用字的预定。由上可知，上述记载差异，即使用网络将之完全发现，而尚无相应的学识，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另外，由于基本知识的缺乏，在利用网络查找资料时，也会使之眼界太窄，提不出尽量多的关键词，从而限制了其所搜资料的数量，说不定其所未能搜到的资料，正是非常关键有用的部分。如有人误认明世宗之父的实录已经佚失，其故当因只知《明史》“艺文志”将此实录记作《睿宗实录》，《千顷堂书目》记作《献皇帝实录》，而不知该实录又名《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此书正是以《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之名而存世，有关书目上如此记载着，撰文专论者也如此称道之。误认其已佚失者如知此名，一上网络即可检得，惜其不知，而造成了如上误判。上述情形，在笔者等修订《明史》校勘之时，就间或遇到。事实告诉我们，在信息时代到来的今天，下笨工夫，对史籍，特别是对重要的基本史籍，细细品读，提高自身的学识、修养，对于明代史籍整理者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明代中后期的历史走向

——黄仁宇传统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说述评

张显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社会历史变迁,有一个向哪里变、向哪里走的问题,也就是历史走向问题。而考察历史走向,是史学研究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关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动及其走向,学术界有许多说法,这里举出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明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第二种观点,在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明后期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而且在上层建筑领域引起相应变化,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①第三种观点,明代中后期虽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思想文化也有新的变化,但是并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种观点,明代既无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第四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及中国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做了全盘否定和尖刻讥讽。他认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见解”;^②是“削足适履,产生一个非驴非马之称呼”;^③“纯系臆度之辞”,^④“淆乱听闻,纵收宣传之功效”;^⑤“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根,遑论萌芽”;^⑥“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其答复则是‘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作飞禽’”^⑦;“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⑧明代不仅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且比前代“衰落”、“倒退”。^⑨也就是说,明代的历史走向是向后退,而不是向前进。

有人说,“今日的中文阅读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从学者、企业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领、高校学生等普通读者均赞誉有加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无疑是最热门人选之一”,以致形成“黄

① 本人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即论述了这种观点。

②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第256页。

③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页。

④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2页。

⑤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2页。

⑥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16页。

⑦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6页。

⑧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6页。

⑨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20-426页。

仁宇旋风”。^① 既然黄先生有如此巨大之影响，因此对他的观点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读过黄先生的论著，我感到，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我们与他之所以存在原则分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 什么是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本标志

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本标志，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黄先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不同的回答。

（一）黄先生的资本主义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黄先生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进行了规定。他说在现代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三个学派”^②中，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学派，不赞同韦伯学派，而属于下面这样的—个学派。这个学派主张，“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之特征，组织上本就预备对付遥远的市场，于是批发商出资垫买商品，因之也干预着零售商及生产者业务。”^③ 他对这派的观点进一步发展，提出资本主义就是“重商主义”、“商业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了今日之暧昧游离。如果我们在当时有机缘插足的话，必会有不同的建议，即像‘重商主义’或‘商业主义’亦较资本主义为佳。”^④ 关于资本主义就是“重商主义”、“商业主义”的定义之所以不科学，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评论。

黄先生按照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评。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他说，他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因为这个学派“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此后对制成品无法过问”。^⑤ 就是说，他不同意从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从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产品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实质，而主张从“技术”的角度加以说明。

他反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说他的著作《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以资本主义为主题，而内中缺乏将‘资本’这一因素的功能与效用仔细琢磨的阶段，恐不免为批评者所指责。可是各章节早已讲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资本虽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点”。^⑥ 又说，“资本”“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有如从‘价值论’延伸到剥削论。这个办法将千变万化的世事，极端简化为几个能被作者笔下掌握的因素，又更进一步将许多具体的事物高度地抽象，然后作者才

① 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年，第1页。

② “三个学派”的说法，乃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在1963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中提出的。陶蒲本人属马克思主义学派。

③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6页；《现代中国的历程》，第166页。

④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512页。

⑤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5页；《现代中国的历程》，第166页。

⑥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512页。

能将笔下的题材纵横解剖，左右逢源”。^① 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学说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绝不像黄先生所说“非其重点”，而是核心、根本、基石；也不像他所说“极端简化”，随意“左右逢源”，而是在对无比丰富的事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所写历史，一般过于呆板，很难注入新的见解。譬如陶蒲（剑桥大学讲师，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到工业资本之形成时，即依马克思而建立其说”，“我们在二十世纪末期，亟于将先进国家的经验，提供给待开发国家参考，若仅能证实由旧社会至新社会阶级斗争无可避免，就无法用它作为今日思想上或行动上之参考。”^② 按此观点，为了“今日思想上或行动上”的需要，资本形成过程中“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历史事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都应该掩盖起来，而不能“呆板”地揭示“由旧社会至新社会阶级斗争无可避免”。

他反对马克思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他说，他“放弃了马恩的‘萌芽’观念”，原因一是“萌芽的一个暗喻，纯系马克思历史家根据西欧的一种特别情形创设”；一是“其范围含糊，没有一种适当的标准”；一是马恩的“萌芽”观念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技术设计”不符。^③ 关于第一、第二原因，西欧“萌芽”说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而不是马克思历史家“创设”的；马恩的“萌芽观念”范围清楚，标准明确，这些我们将在下文详述。第三个原因是他放弃马恩“萌芽观念”的根本原因，即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判断资本主义出现的主要标准，有着不同的看法。按照他的“设计”，如果一个国家“在技术上”实施了“三个条件”，那么“资本主义已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了”。所谓三个条件是：“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首先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广泛地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扩大，超过老板本人耳目足以监视之程度”。“而且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还要共同使用，这样企业活动的范围，才能超过每个企业力所能及的界限。”^④ 他这三个判断资本主义“落地生根”的标准，抽去了最重要、最本质、最核心的生产关系内容，而以“技术”性的经营管理方法为基准，这样的标准为什么不科学，我们将在下文加以阐述。单从技术层面，这三个标准也弹性过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资本主义才“落地生根”，很难把握。例如，关于“资金活用”，从历史久远的商业借贷到今日的金融衍生品，究竟在哪个阶段上，资本主义“落地生根”了？关于“交通通讯”，从人力车到蒸汽火车到高铁，从驿传到电话到网络，又是在哪个阶段上，资本主义“落地生根”了？这样的标准才真正是“范围含糊”，没有一种恰当的标准。

他说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不知为什么，黄先生一再说，马克思“从未使用”、“未曾用过”资本主义这一名词，^⑤ 也许是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论述吧。其实，马克思在1861—1863年撰写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即已提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⑥ 此后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大量使用了“资本主义”

①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512页。

②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166页。

③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177页。

④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177页。关于“三个条件”，另见他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1—32页、第493页；《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54页。

⑤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页、第16页、第26页；《现代中国的历程》，第175页、第254页。

⑥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8页。